

文史知识

WEN SHI ZHI SHI



- 略谈永贞革新
- 晚唐宫廷名伶李可及
- 唐代的马球场
- 传统文化与国学

王素

李日星

张新清

倪其心

8
1994

文史知识

主编 李 侃

1994 年第 8 期

· 治学之道 · 自甘淡泊 潜心宋学

——记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教授

方 健 3

· 历史百题 · 略谈永贞革新

王 素 12

· 文学史百题 · 略论宋代哲理诗

金舒年 19

· 文史书目答问 · 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

黄爱梅 童 贻 25

人物

长孙无忌——贪恋权势的悲剧人物

李 波 喻雅君 30

春秋

晚唐宫廷名伶李可及

李日星 34

· 怎样读 · 《周易》：从人学、神学到哲学

胡崧生 胡 健 39

咏史诗的基本特征和美学鉴赏

杨仲义 44

文化

隶书小史

陈 虎 49

史

古代的拱揖跪拜

张 标 55

知识

唐代的马球场

张新清 60

· 中外科技交流漫话 ·

中泰科技交流的历史回顾

汪前进 64

绘有限之象 蕴不尽之意

——谈李商隐诗的多重美感效应

王泽文 72

漫话晚唐五代词中的“雨”

黎烈南 73

情由景观，既是伤春更自伤

——冯延巳《采桑子》词赏析

吴在庆 赵 莹 82

愁肠百结 自成绝唱

——试谈李煜离愁词的艺术表现手法

雨 田 84

· 中外文化交流与比较 ·

明清欧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介绍(二) 吴孟雪 87

传统文化与国学 倪其心 92

语言知识
陵、东陵与“东陵大盗” 刘复生 70
“堕于橐驼前”释 刘喜军 98
《离骚》灵氛筮语用两“曰”字发微 黄灵庚 101

读书札记
中兴名将小考 侯会 104
从华太师为唐伯虎改名说起
——“部曲”制度及其变迁 叶九如 110

· 青年园地 · 略谈江南自强军 刘鹏举 张力 113

古代的题壁诗 曹之 118

“诗”与“真”——漫谈陶渊明与酒
〔德〕卜松山(Karl-Heinz Pohl) 121

宋耀州窑清釉刻花牡丹纹瓶 陈润民 123

· 文史古迹 ·

造型独特的晋祠美人鱼塑像 常文林 124

· 书评 · 金针度人, 后学津梁
——评介《敦煌文学概论》 白化文 126

· 补白三则 · 古于阗吉祥天女壁画(29)《离骚》求女喻意何在(38)《中国文学思想史合璧》出版(63)炎黄之争(103)

牡丹纹瓶(封二) 山西晋祠水母楼侍女塑像(封三)

自甘淡泊 潜心宋学

——记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教授

方 健

熟悉邓广铭先生的人都知道，邓先生有自行恪守的约法三章：不接受记者采访，不写回忆录，不撰自传。这对于中国学术史和北大校史不能不是个遗憾。近几年来，笔者因公务多次诣燕园拜望邓先生，蒙拨冗赐教，每畅谈至夜深，获益匪浅，兹据所记片断撰成此文，以见邓先生人品学问、道德风范之一斑。

一

邓先生1907年出生在山东临邑县，在旧中国，这是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。邓先生是北大创办以来的第三名临邑籍学子。约在70年前，邓先生就读于山东第一师范学校，在泉城，他结交的两位朋友——臧克家和李广田都是文学名家，李广田一度曾醉心于陆王之学，而邓先生却对文学有浓厚的兴趣，这种青年时代的知识积累，在其名著《稼轩词编年笺注》和史学论著中如行云流水般的文笔中随处可见。

邓先生对北大是心向往之，但初次报考却并未如愿。1931年，他先考取了辅仁大学英文系，约在此时，认识了著名翻译家、文学家萧乾（现任中央文史馆长）。第二年，邓先生终于考取了情有独钟的北京大学，开始了他的史学生涯。除了抗战时一度由傅斯年先生介绍去重庆复旦任副教授三年多外，邓先生再未离开过北大。在北大生活了60年之久的老人，除了陈岱孙先生外，似还找不出第三人。学生时代的邓广铭，先后与傅乐焕、金克木等人一起为《益世报》副刊办《读书周刊》，持续了好几年时间。

1936年，邓先生从北大毕业，留校任教。当时的北平已是黑

云压城、山雨欲来之际。邓先生曾多次谈到北大对他影响最深的三位老师：胡适、傅斯年、陈寅恪，其中有不少鲜为人知的轶事。可惜笔者只能凭记忆所及追记一二：邓先生早年选择辛弃疾、陈亮、韩世忠、岳飞等历史人物为研究对象，固然是有感于国难当头，民族危机，力图以历史上的爱国志士激励全民族的抗战意志，但邓先生的成名，与胡适等三位先生的知遇之恩、提携之功密不可分。邓先生刚从北大毕业，欲以辛稼轩为研究课题，申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的资助，就问胡适有无可能。胡适勉励说：“30岁以上的人做学问，是本份；30岁以下的人做学问，应该得到鼓励。”当时，邓先生已写就《〈辛稼轩年谱〉及〈稼轩词疏证〉总辨证》一文，对大名鼎鼎的梁启超、梁启勋兄弟两部书中的不足和错讹进行了考辨，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。文章由萧乾发表在《国闻周报》后，深得陈寅恪先生激赏，由于陈先生在基金会有一言九鼎的地位，于是如愿得到二年的资助。邓先生在沦陷后门可罗雀的北平图书馆埋头治学，细大不捐地钩玄剔抉，审慎考辨，用宏取精，历时两载，完成了这二部出手不凡的扛鼎之作。邓著《辛谱》要言不烦，考证精密，纠正了前人许多舛误，开近人撰写宋人年谱体先河。《稼轩词编年笺注》更是渗透了邓先生深厚的史学素养和文学功力，迄今已三版，印数达数十万册，增补修订后的第4版行将刊行。这部书被茅盾誉为“传世之作”，确非偶然。

1940年，历史语言研究所内迁四川南溪李庄，当时，迁往内地的各高校、科研机关，唯史语所内迁时携带了全部图书、资料。时任所长的傅斯年要邓先生同赴李庄，邓先生发奋撰成《宋史职官志考正》，陈寅恪先生击节称叹，欣然为之撰序，由傅先生全文发表在《史语所集刊》第10本上。后来，经傅荐举，邓先生又应约为重庆一家出版社撰写《岳飞》一书，1944年再去李庄，一扫前人“以史识论，‘全无独断之学’；从史实看，‘全少考索之功’”的弊病，广泛搜集资料，确切地勾勒出岳飞生活的时代背景，状写了岳飞的形象和丰采，思想和情操，对岳飞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作出了高度评价，对秦桧、赵构之流民族败类，则予以深刻揭露和无情鞭

挞。此书初版，恰逢抗战胜利之日；1954年《岳飞传》再版；1983年又出了增订本，历久而不衰。

抗战胜利后，傅斯年于1946年5月初飞返北平，主持北大复校工作。傅先生规定：凡投敌事伪的教职员工，哪怕学问最好，名气再大，一律不予聘用。数日后，邓先生即返北平报到，行装甫卸，傅就让工友搬来一张办公桌，让邓先生协助处理复校事务。当时，胡适应邀主编《大公报·文史周刊》，实际编务全由邓先生独自承担。邓先生在北大求学时，曾选修过胡适的传记文学课，邓撰《陈龙川传》深得胡适赞赏，胡因此让邓进一步研究辛弃疾。胡主张写白话文，反对文言文；傅则认为用文言、白话写作可悉听尊便。与胡、傅的关系，成为邓先生“文革”中的“一大罪状”，为此而吃尽了苦头，但邓先生坚持沉默是金，不发违心之论。他多次对笔者说过：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是有名的“大炮”，经常抨击国民党的腐败；胡适本质上是学者，与国民党有距离，决非什么蒋介石的“御用文人”。胡适书赠邓先生的条幅，“文革”中未及装裱夹在《列宁全集》中，才得以幸免于难。

对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和人品，邓先生服膺终生。1939年，邓到昆明，任职于北大文科所，时陈先生兼任该所导师，同住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3号一年有余。同寄一寓的还有陆培德、汤用彤、郑天挺、姚从吾等著名学者。同桌而餐之际，谈兴所至，往往涉及上述诸公擅长的研究领域，如语言学、佛教、明清史、宋元史等，这些各自领域的一流学者，就只有洗耳恭听的份，只听陈先生一人侃侃而谈，无敢插言者，足见陈先生的博大精深，难以企及。邓先生在深情回忆这段半个世纪前的往事时，那种倾心仰慕的虔诚神态给我留下极深印象。他说：陈先生体弱多病，既要任课教书，又有社会活动，天知道他何时读了这么多书，装了满肚子学问。他对陈先生的人品亦极为推崇。陈先生出身于名门望族，与国民党达官贵人俞大维是很近的亲戚。抗战胜利后，陈先生应聘回清华执教，时值严冬，生活用煤奇缺，价格昂贵。陈先生如果向俞开口，煤唾手可得。但陈先生宁可写信给胡适，把自己珍

藏的孤本秘籍转让给北大图书馆，以换取生活用煤。邓先生曾援用顾炎武“博学于文，行己有耻”的话来概括陈先生的立身准则，这也是他自己不倦的人生追求。

二

邓先生的治学谨严是有口皆碑的，他对古籍整理工作相当重视。徐梦莘《三朝北盟会编》是他精心研读、用力甚深的一部大书，对此书引用资料不“私为去取”、“妄立褒贬”，为攻治宋史者提供了“思辨和考索的广阔天地”的长处，邓先生评价极高。多年以来，邓先生用不同版本通校了此书，至今犹托人取台北藏本进行对校，愿以耄耋之年校完此书。邓先生点校司马光的《涑水记闻》，“文革”前就发凡起例，不遗余力地考订版本源流，汇校现存各本，发现《长编》引文最接近原书面貌，最后才移交张希清同志作具体点校工作。此书堪称中华书局《唐宋史料笔记丛刊》中的精品，其非凡功力在卷首《略论几个问题》、《点校说明》和校记中随处可见。邓先生东渡扶桑，复印回一部赵汝愚主编的《国朝诸臣奏议》，立即组织力量，主视点校、整理，经亲自出面斡旋，多方奔走，始决定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，于治宋史者，实乃又一功德无量之盛事。他对《全宋文》、《全宋诗》的陆续出版深表欢欣鼓舞，同时又提出了许多具体入微的意见。前几年，笔者送他一册沈阳出版社出版的《范仲淹史料新编》，此书装帧精美，还有几个封诰卷子为首次发表，适逢《人民日报》记者采访，邓先生对记者谈到此书点校中断句的错讹和不足。见报时，记者误书为《全宋文·范仲淹文》错讹甚夥，引起《全宋文》编者的不满。其实，某编辑点校的范仲淹诗文错讹实在太多，已非“校书如扫尘，旋扫旋生”之说可以自我解嘲。邓先生向来认为：心绪浮躁者搞不了古籍整理，更谈不上做学问。古籍整理乃千秋大业，来不得半点漫不经心，如果以急功近利的商品化速率搞古籍点校，必然错讹百出，与其这样糟蹋古书，不如选择善本进行影印。

几经周折，邓先生最近已审完自选论文集的校样，即将由北京和海外同时出版，自选集的序，令邓先生煞费苦心，几乎是他

60年学术生涯的简要回顾。邓先生的论著不作惊世骇俗之论，不务揭奇抒异之术，而是对史料尽可能广泛搜采，罗列排比，去伪存真，审查鉴定，继之以分析综合，探索其内涵，考求其外延，总结出有规律性的带指导意义的结论。邓先生的论著，资料翔实，内容丰富，立论谨严，思想深刻，多有创见，几乎涉及宋史研究的各个方面。据说他著书立说从不做卡片，只在书中夹纸条，这种超人的记忆力令人叹为观止。他主张论从史出，既反对只知积累、考辨资料的短钉之学，也反对写天马行空般的海派文章。

邓先生对史学界几代学者在所谓“五朵金花”的论战中浪费的时间、精力和才华深感惋惜和痛心。对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的时代烙印也进行了深刻反思。他念念不忘重写《王安石》，力图重新对王安石、司马光等历史人物给予科学评价。在关于宋江问题的讨论中，邓先生对自己未读过足本《李若水集》中的《捕盗偶成》诗，因而导致的疏忽，也作了开诚布公的自我批评。本来，北大未藏有此书，邓先生看的是节本，但他并不因此而原谅自己。1984年邓先生应邀赴港，在一次学术讲演中，他开宗明义，修正了20余年前在《中国史纲要》一书中将理学等同于宋学的观点。他指出：宋代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；宋学是糅儒、释、道于一炉的新儒家学派。其特点是“致广大”，以经世致用为宗旨；“尽精微”，对儒学义理进行深入探索。理学不过是宋学的一个分支和流派。此论高屋建瓴，为海内外学术界所广泛接受，后来成为他的一个学生的博士论文《北宋文化史述论》的指导思想。邓先生这种不随风阿附，不文过饰非，真诚坦率，唯真理是从的学者风范赢得了学术界的高度尊敬。

邓先生对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向来热心。前不久，汤一介教授等发起在北大成立国学研究中心，邓先生等一批老教授积极出谋划策，认为弘扬国学，实为当务之急。《人民日报》为此发表了整版报道。邓先生提出：国学的提法，未免太陈旧，难免会有异议；有的学者称之为东方文化，似乎也不够确切；他主张称之为中国传统文化，要批判地吸收其中的精华。他是不主张搞《中华

大典》之类“跨世纪工程”的，他主张有计划、有重点地整理、点校、影印出版一批古籍，以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精粹。对于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宋史研究的现状，他认为已比过去有长足进步，但还不能尽如人意。他希望能有一部高质量的宋辽金夏断代史尽快问世。从1980年起，他倡议成立了中国宋史研究会，亲任会长12年之久；组织了五届年会，三次国际学术研讨会，从学会的章程，《宋史研究通讯》的出版，会议的组织，论文集的编审出版，经费的筹集……事无巨细，无不事必躬亲，呕心沥血。他希望的是多出人才，快出成果，去赶上国内其它断代史的研究水平，去夺取国际宋史研究的桂冠。为此，在教书育人的同时，邓先生不顾年高视弱，克服写字手抖的困难，孜孜不倦地仍在辛勤耕耘，著书立说。真是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

邓先生在北大执教近60年，桃李满天下。一代代邓门弟子，多已成为宋史研究的中坚和骨干。邓先生对学生的严格是出了名的，对于著述频丰，甚有名望的早期学生更是严格得近乎苛求。而对初涉宋史的年青学子，却循循善诱，比较宽容。邓先生曾多次向笔者讲述过他与学生间的故事，兹略记一二。

邓先生的学生中，有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干部，仅仅是因为1957年北大划右派指标未完成，她不过说了几句公道话，在1958年被补划为右派，发配到云南西双版纳的中学执教，被剥夺了学术研究的自由，而她的几个同班同学已成了宋史学界的佼佼者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她的冤案得到平反，被调昆明执教。1984年，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要为老专家配备助手，北大有23位老先生获此殊荣，其中两位需从校外调入。邓先生首先想到的就是身处逆境的她，她曾为首届宋史年会写来了高质量的论文，显示了不凡实力。名单上报后，很快获准，调令发至昆明，西南民族学院已捷足先登，邓先生亲自出面交涉，该院院长只同意借用，不肯放行。好事多磨，邓先生说：不如意事常有之，留下了太多的遗憾。直到现在，邓先生还和这位弟子保持着密切联系。也许，在外人和校方看来，邓先生爱女小南，秉承家学，可为邓先生分忧。知道内

情的人都了解：小南自己集科研、教学、家务于一身，自顾尚且不暇，累得有病，一年中住院时多，倒时常令邓先生牵肠挂肚。邓先生不仅平时生活完全自理，连写信、寄书、接电话、取报纸之类琐事亦需自己办理，牵扯了许多精力。这里笔者仍想呼吁，应尽快给邓先生这样的老专家配备助手，即使从抢救学术史、北大校史“活档案”这一角度考虑，亦亟应引起重视，尽快落实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恢复高考制度，邓先生出任北大历史系主任，筹备成立中古史研究中心，制定了“多出人才，快出人才；多出成果，快出成果”的办学方针。一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，在宋史、敦煌学、民族史研究等领域，涌现了世人瞩目的学术成果。去年香港《文汇报》记者采访邓先生，发了一个专版，其中有一幅照片，即他在为几位得意门生上课，极为生动传神。今年暑假，邓先生送走了最后一批研究生。他教书育人并重，对研究生不仅从治学方法到论文选题均悉心指导。尤重思想品德的陶冶。有位博士生，学问很好，文章也漂亮，邓先生时时叮咛：要在人生的道路上注重待人接物。还有一位博士生，两次论文答辩未通过，许多人不理解，近几年也几乎绝无仅有。邓先生考虑得很深很远，为的是对学生的将来负责，而且北大严谨的学风使他不能降格俯就。有位学生写了篇论文，呈邓先生审阅，邓先生让他三易其稿，精心修改，字斟句酌，比自撰论文费时还多。发表时，学生把邓先生大名署在前面，邓先生亲手在校样上把自己的名字划去。还有一位研究生，是“掺沙子”进入高校的，头脑颇灵，一次在写《论范仲淹教育思想》时，引用史料出现几处错误。记忆过人的邓先生发现后，逐条批改，并严肃指出：“像你这样不用功，会毕不了业的。”直言不讳，语重心长，这就是邓先生的风格。从此，这位学生发奋努力，终于在边疆民族史研究上有了成果，完成了《章惇年谱》，毕业后被留校任教。邓先生还接到海内外许多素不相识的人的求教信和论文，只要有可能，总是予以帮助。湖南一位研究胡适的青年学者，仅在香港胡适研究会上与邓先生有一面之缘，他想来北大做博士，但北大无此专业的导师，邓先生千方百计从清华

请了一位兼职教授任导师，遂其心愿。邓先生的几位学生出国深造，亦得力于他的鼎力荐举。

三

生活中的邓先生是个慈眉善目的忠厚长者，除了喜欢喝好茶外，无任何嗜好。邓先生起居有规律，饮食有节制，每以粗茶淡饭为乐，常吃粗粮，餐桌上玉米面、红薯常年不断，从不挑食。他笃信：生命在于运动，每天下午，步行往系里取报纸信件，风雨无阻。天气不太冷时，晚上也做做健身操。为人豪爽，性格开朗，这可能就是他长寿的秘诀。他从不记得节假日，也不过生日，全身心沉醉于学术之中。

邓先生与许多名人都有交往。他的客厅里挂着郭沫若、茅盾题赠的条幅。笔者出于好奇，曾问起过其来历。那是在五十年代，《稼轩词编年笺注》初版，寄奉茅盾先生一册，茅公很快亲笔复信并附来了这幅墨宝。三十年代，他的《总疏证》发表后，夏承焘先生来信说，夏拟撰《唐宋十家词人年谱》，其中有辛弃疾。夏说：看了你的文章，年谱不敢作了，如果需要，可以把搜集到的一点材料寄奉，辛谱应当由你来作。当时夏已享有盛名，主编过《词学季刊》，而邓先生不过是初出茅庐的青年助教。邓先生一直深深地怀念这位提携后生的前贤。

他和齐白石的交往更是有趣。白石老人曾请胡适撰写年谱，胡草就底稿后，离开北平前，转交邓先生修订。邓先生在修谱中发现：从某岁起，老人的题画年龄突然比实际年龄大了二岁，百思不得其解，遂请教老人。白石答曰：幼时算命，称此二年为“坎”，为消灾，遂跳过二岁。闻此邓先生恍然大悟。从此邓先生与白石过从甚密。当时邓先生与白石住得很近，一次携长女拜访白石老人，老人欣然挥毫作画题赠，跋云（大意）：恭三先生女公子书法如此清新脱俗，必前程无量云云。白石先后赠画十几幅。可惜的是，这些稀世珍宝“文革”中扫地以尽。当时历史系的一名学生抄家时拿走了这些画，曾留有收条，后自称交给系里。十年浩劫后，虽经多方追查，终无下落，关心此事的同志曾建议邓先生诉诸法

院，终因历时太久而未能如愿，此事成为邓先生晚年一大心病。邓先生买书只求实用，不究版本。但有时无心栽柳，却也成行。他曾偶得一部明刻《历代名臣奏议》，当时为研究之需而购买，此书因卷帙浩繁，再无复刻传世，颇为珍稀。十年浩劫后，各大图书馆藏本已屈指可数，成为秘不示人的珍本。当上海古籍出版社欲影印出版时，邓先生慨然允借。海内外治宋史的学者，不少人撰写专著，都从邓先生那里得到过珍藏的拓片和画像，作为书影。

邓先生曾多次应邀赴海外讲学，结交了不少朋友。如对刘子健的博学，唐德刚的直言不讳，叶嘉莹女士的谦逊，斯波义信的人品、学问都有高度评价。每当有朋自远方来，邓先生总是热情接待。一次，一位日本学者诣北大访邓先生，受阻于校门口，邓先生冒着正午的大太阳，步行数里至门口迎接。他对在海外讲学受到的盛情款待，时时念及。邓先生常说：受人之惠，当涌泉相报。他因未能为斯波义信做点什么而负疚不安。他想请斯波来北大讲学，想组织力量翻译他的名著《宋代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》，介绍给中国学者，可惜都因故未能如愿。

最后，笔者想引用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半个世纪前有预见性、哲理性的两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。

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年之演进，造极于赵宋之世。后渐衰微，终必复振……宋代之史事，乃今日所亟应致力者。……《宋史》一书，于诸正史中，卷帙最为繁多，数百年来，真能熟读之者，实无几人。……邓恭三先生广铭，夙治宋史，欲著《宋史校证》一书，先以《宋史职官志考证》一篇，刊布于世。其用力之勤，持论之慎，并世治宋史者，未能或之先也。……是其神思之缜密，志愿之果毅，逾越等伦。他日新宋学之建立，先生当为最有功之一人，可以无疑也。……先生则始终殚力竭智，以建立新宋学为务，不屑同于假手功名之士，而能自致于不朽之域。（《金明馆丛稿二编·邓广铭〈宋史职官志考证〉序》）

略谈永贞革新

· 历史百题 ·

王 素

“永贞革新”，是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，亦即其子顺宗永贞元年（805），由一些低级官僚士大夫发动的一场变革新政运动。这场运动，虽然背景并不复杂，经过也不曲折，但影响却很深远，评价亦很悬殊。因不少文坛巨匠卷入其中，故特别受到人们的关注。

一、永贞革新的背景

关于永贞革新的政治背景，一般认为主要有二：

一是藩镇割据。安史乱后，中央对地方失控，逐渐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。德宗时期，藩镇割据的形势日益严峻。而藩镇之乱，也此起彼伏，迄无宁日。建中四年（783）十月，泾原兵奉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主，大举造反，德宗被迫出奔奉天，转走梁州，直到兴元元年（784）七月，才得以重返长安。此后，长安又屡遭藩镇围困，有如一座危城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何抑制藩镇势力，重建中央集权，成为唐王朝君臣必须正视的问题。

一是宦官专权。安史乱后，君主不信朝臣，宦官得以干政。肃宗时的李辅国，代宗时的程元振、鱼朝恩，以宦官执掌兵符，权力更大。德宗出奔奉天，因窦文场、霍仙鸣护驾有功，归以二人为神策中尉，宦官主管禁军遂成为制度。此后，宦官以军权在手，无所顾忌，干政益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何抑制宦官势力，夺回国家军权，也成为唐王朝君臣必须正视的问题。

另外，贪鄙当道，贤能被逐，苛征如虎，百姓涂炭，亦成为唐王朝君臣需要正视的问题。

关于永贞革新的人事背景，一般认为也主要有二：

一是高级官僚士大夫注重既得利益，对变革新政不感兴趣。如老宰相贾耽，《旧唐书》本传称：“自居相位，凡十三年，虽不能以

安危大计启沃于人主，而常以检身厉行律人。”对防嫌免祸非常留意，对国家安危不想关心。新宰相高郢、郑珣瑜，亦均小心谨慎，而无显赫政绩。他们很容易与一些老藩镇、老宦官携手合作，共同维护旧的秩序。

一是低级官僚士大夫身无长物，不怕冒险，敢于以变革新政为己任。如王伾，仅官太子侍书；王叔文，仅以棋待诏为东宫侍读；刘禹锡、柳宗元、程异，仅官监察御史；韦执谊，仅官吏部郎中；凌准，仅官侍御史；韩泰，仅官户部郎中；韩晔、陈谏，史书不记当时任官，职位显然更低。他们很容易与一些官朝新进携手合作，共同开创新的局面。

另外，君主的态度，也为人事背景之一，对反对或主张变革新政的双方，也都有很大的影响力。

二、永贞革新的经过

贞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（癸巳），德宗死。二十六日（丙申），太子即位，是为顺宗。变革新政运动，自此拉开序幕。

据记载，顺宗为太子时，即有变革新政之志。他最宠王伾，而与王叔文尤为志同道合。同时，刘禹锡、柳宗元、程异、凌准、韩泰、韩晔、陈谏以及陆质、吕温、李景俭等，也都与二王相结，最终形成一个以“二王刘柳”为核心的革新党派（《旧唐书·刘禹锡传》）。这个革新党派，可以说是在顺宗的直接领导下形成的。可惜的是，顺宗在即位前，突患暗疾，口不能言；即位后，一切依靠二王，不能亲自指挥。变革新政运动的前途，一开始就呈现不祥之兆。

当时，顺宗用王叔文为翰林学士，王叔文用韦执谊为尚书左丞、同平章事。翰林学士掌白麻内命，亦即机密诏令；同平章事为宰相。有职有权，本对革新十分有利。但上传下达的渠道不畅。顺宗垂帘问政，仅宦官李忠言、美人牛昭容侍左右。上传之事，要一经过韦执谊，二经王叔文，三经王伾，四经李忠言，五经牛昭容，才能为顺宗所知晓。下达之事，环节亦同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变革新政自然也就不可能顺利。

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，革新党派主要做了以下两件事：

一是企图抑制藩镇势力，重建中央集权。浙西观察使李錡，原兼诸道盐铁转运使，使“盐铁之利，积于私室，而国用日耗”。至是解其职，将财政大权从藩镇收归中央。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，派支度副使刘辟求总领三川（即剑南东川、西川及山南西道），并扬言：“若与某三川，当以死相助；若不与，亦当有以相酬。”王叔文大怒，欲杀刘辟，辟仓皇逃走。

一是企图抑制宦官势力，夺回国家军权。先罢禁掠人扰民的官市及五坊小儿，再减停官中闲杂人员及内侍多人俸钱，以抑制宦官势力。然后，以右金吾大将军范希朝为京西左、右神策军节度使，度支郎中韩泰为其行军司马，以夺回禁军军权。可惜宦官醒悟，知道“从其谋，吾属必死其手”，密令诸将勿以军权授人，使革新党派的计划落空。

另外，就是惩贪鄙，用贤能，免苛征，恤百姓。京兆尹道王李实，为唐宗室，残暴掊敛，被贬为通州长史，市井为之欢呼。用能吏杜佑摄冢宰，并兼度支及诸道盐铁转运使。召被贬贤臣郑余庆等回京。郑余庆后任宰相多年，颇有清誉。规定两税外，“不得擅有诸色榷税”；常供外，“不得别进钱物”。并免除百姓积欠的租赋课税，达五十二万六千八百四十一贯（钱）、石（粮）、匹（绢）、束（丝、草）。

如此变革新政，自然使既得利益者大为不满。遽年三月，侍御史窦群、御史中丞武元衡，即将革新党派列为异己，并进行攻击。同时，宦官俱文珍、刘光琦、薛盈珍等，“皆先朝任使旧人”，疾李忠言为宫中新进，王叔文等朋党相结，借顺宗病久不愈，立广陵王淳（后改名纯）为太子。三位宰相，高郢无所作为，贾耽、郑珣瑜称疾不起，以表示与革新党派不合作。六月，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、荆南节度使裴均、河东节度使严绶等，也相继向顺宗及太子奏表进笺，攻击革新党派。而在此之前（五月），王叔文因前充度支及盐铁转运副使，加拜户部侍郎，俱文珍等已趁机削去叔文翰林学士之职。如前所说，翰林专掌机密诏令，职权甚重。叔

文失去此职，便无法领导变革新政运动。王伾为之一再疏请，也只允许“三五日一入翰林”。形势已经不利。至此，叔文又因母丧去位，形势更急转直下。七月，韦执谊不听叔文调遣，革新党派内部分裂。同时，王伾再三上疏，请以叔文为宰相，不报，知事不济，亦称病不出。而既得利益者却较为团结。在这种形势下，变革新政运动已无法再进行下去了。

同年七月二十八日，俱文珍等逼顺宗下制，称：“积疾未复，其军国政事，权令皇太子纯勾当。”同时，以更为志同道合的袁滋、杜黄裳为宰相，以取代高郢、郑珣瑜。八月四日，既得利益者又假顺宗制：“令太子即皇帝位，朕称太上皇，制敕称诰。”五日，太上皇徙居兴庆宫，诰改元永贞。六日，贬王伾为开州司马，王叔文为渝州司马。伾不久死于贬所，叔文翌年亦被赐死。九日，太子纯才正式即位于宣政殿，是为宪宗。九月十三日，贬刘禹锡为连州刺史，柳宗元为邵州刺史，韩泰为抚州刺史，韩晔为池州刺史。十一月七日，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。朝议谓刘、柳等人贬太轻。十四日，再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，柳宗元为永州司马，韩泰为虔州司马，韩晔为饶州司马；又贬程异为郴州司马，凌准为连州司马，陈谏为台州司马。此十人，合称“二王八司马”。至此，变革新政运动彻底失败。

三、永贞革新的影响

这场变革新政运动，虽然仅半年便告彻底失败，但对后世的影响，却远非半年所能估算。以革新党人刘禹锡的个人遭遇为例：被贬之前，本官屯田员外郎；被贬之后，因制有“逢恩不原”之令，在朗州一住便是十年。其间，当政者或惜其才，欲渐用之，而宪宗亦诏迁禹锡等为远郡刺史。但适逢武元衡为首相，衔旧怨（元衡曾为德宗山陵仪仗使，禹锡求充仪仗判官，元衡不与，被革新党派罢为右庶子），谏官十余人又论列，言不可复用，最终亦无转机。元和十年（815），始召还，仍欲用为郎官。禹锡至京师，作《游玄都观咏看花君子》诗，由于“语涉讥刺，执政不悦”，又被出为播州刺史。自此去京师又十余年。文宗大和二年（828），再从和州刺史

任上召回，用为主客郎中。禹锡至京师，衔前事未已，又作《玄都观》诗，序谓“唯免葵燕麦，动摇于春风”。据说“执政又闻谏，滋不悦”。以致武宗会昌二年（842），禹锡卒，也仅官至检校礼部尚书。由此可见，该运动影响之长久。

另外，有唐一代，朋党虽然产生甚早，但朋党之争却迟至贞革新才形成。据《旧唐书·韦执谊传》记载：贞元十九年（803）补阙张正一与韦成季、王仲舒等七人，以曾同官而相善。或告执谊云：“正一等上疏论君与王叔文朋党事。”执谊时官翰林学士，因奏云：“韦成季等朋聚觊望。”导致成季等七人尽被斥逐。至永贞革新正式开始，朋党之争更为激烈。后来，永贞革新虽然失败，旧的朋党之争并未消失，新的朋党之争又起。著名的“牛李党争”，即产生于宪宗元和（806—820）中。此后直到唐亡，朋党之争基本从未间断。由此亦可见，该运动影响之长久。

至于该运动对藩镇和宦官，影响自然更为深远。宪宗初即位，藩镇就开始向中央政府进行挑战。当时，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卒，支度副使刘辟自为留后，并令诸将为己上表强求节钺。朝廷不许，以宰相袁滋为剑南东川、西川及山南西道安抚大使。不久，朝廷恐安抚无效，又以袁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，而征刘辟为给事中。刘辟自然不受征，且出兵阻袁滋入川。袁滋不敢进，被贬为吉州刺史。朝廷不得已，终于以刘辟为剑南西川节度副使、知节度事。但藩镇见朝廷如此可欺，又岂肯甘心于眼前既得之小利？元和元年（806）正月，刘辟仿前任韦皋求总领三川，不得，竟举兵造反。二年（807）十月，镇海节度使李錡因不愿入朝，亦举兵造反。九年（814）闰八月，彰义节度使吴少阳卒，其子元济匿丧自为留后，并纵兵侵掠，危及东都。十年（815）六月，淄青节度副大使李师道派人刺杀宰相武元衡，并助吴元济与朝廷对抗。这些藩镇叛乱虽然最终都被平定，但朝廷的元气也因此而大伤。不久之后，藩镇叛乱再起，直到唐亡，朝廷也无法加以控制。

同时，宦官继续掌握军权，势力也一发而不可收拾。自宪宗开始，唐朝有八个皇帝为宦官所立。而宪宗以及敬宗，又均死于